

老木按：日本早稻田大学亚洲研究机构当代中国研究所讲师张望，日前发表文章，对中日两国在钓鱼岛争端、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背后的两国(民众)心理认知进行探究分析，为我们研究中日问题提供了一定的视角，老木特将此篇文章推荐给大家。当然，张望的观点也只能是一家之言，老木敬请读者自行品鉴。

2012年秋，日本放送协会(NHK)在黄金时段连续3周播出有关中华文明的纪录片。该片通过介绍夏朝的诞生、汉字的出现和秦国的中原统一，探讨中华文明5000年不衰的奥秘。整个纪录片回顾历史，亦不断穿越时空，剖析当前中国，且解说充满危机感：日本，正无可避免地面对东亚大陆中华文明的再崛起。

自2012年9月日本政府宣布钓鱼岛国有化后，中国和日本就这一岛屿的主权纠纷成为东亚地区，乃至世界关注的焦点。直到最近，两国之间的领土纠纷仍未有解决迹象。中日钓鱼岛问题僵持不下，表面看似纯属领土问题的对立，但究其深层成因，与两国心理上长期的相互误读有莫大关系。

日本国内主流对钓鱼岛问题的认知，是放在近年来中国国力崛起的背景下来考量，并未将其视为战后历史问题。这种认知微妙，且带有情绪性。在中国，不少人对分析预设：正如上世纪30年代，日本正千方百计地意图阻碍中国的崛起和发展。然而，从日本内部来看，我们虽然不能否认日本面对中国崛起的复杂心态，但日本主流最为反感的，是中国居高临下的态度。

日本这一弱国抵抗心理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98年。当时江泽民访日时要求小渊惠三首相就历史问题道歉。日本国内认为1972年中日建交，1992年天皇访华时，日方都已作出正式道歉，北京又提道歉，是对日本重复打历史牌。北京的道歉外交，连当时日本国内不少亲中的政治家和记者也感到不满。

日本这种基于弱国意识的对中强硬情绪，还

中日两雄的心理距离

可以从靖国问题的民意调查中看出端倪：根据日本学者一谷和郎的研究，在是否支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议题上，2001年至2005年的日本各大报章的民调都显示，反对参拜的日本民众多于支持参拜。但是，当把调查提问改为“是否支持外国政府在靖国问题上的抗议”时，大部分日本民众都持抵制态度。笔者身边有不少研究中国、对中国友好的日本学者，他们也表示，感到中国总不能以平等的姿态来对待邻国，态度傲慢。即使中国主张“不称霸，行王道”，但在一些日本知识分子眼中，“王道”本身，也是一种天朝大国居高临下的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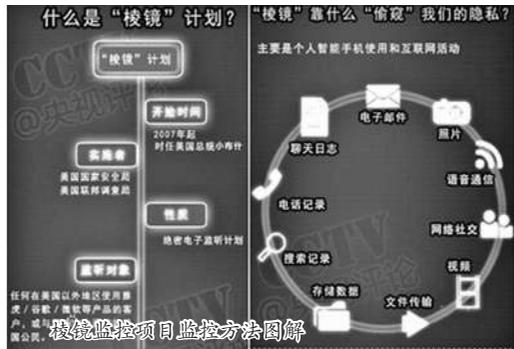
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后，日本民主党政府在北京强大的外压下称释放渔船船长，进一步加深了日本的弱国心理，令日本人强烈感到受中国压迫。在这一不信任的氛围下，当中方提出日本需重回搁置共识，承认钓鱼岛存在领土争议时，日方却会怀疑中国背后的动机，质疑北京是否会提出进一步领土要求。中国基于防卫意识而提出的外交主张，在日本看来却是对外扩张的表现。早前《人民日报》刊登有关“琉球再议”的文章，更加强了日本国内的这一认识，陡然成为了日本右翼说服民众接受中国正成为“扩张霸权国家”的论据。

从中国角度来看，由于甲午战争以来饱受日本侵略欺凌的屈辱历史和悲情记忆，钓鱼岛问题直接涉及到中国外交中最为敏感的问题领域：即主权和领土问题，和中国的国家尊严和政府合法性息息相关。回顾历史，中国历届政府都强调，在主权问题上没有商量余地。1990年代末的香港澳门问题，都是在“主权在我”的前提下才得以解决的。

过去几十年来，日本国内主流看待中国，也往往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中国国内社会制度的未成熟，和中国对日抗议游行中出现的暴力行为，更令日本以民主国家自居，贬低中国是一个不可理喻的异质国家，不屑于尝试去理解中国的想法，以为只要以美日同盟为后盾，就一定能够逼迫中国让步。

过往中国对外交的历史经验证明，北京往往在危机中既有现状一再被打破的情况下接受风险，实施战略上的积极防御，被迫动用武力。1950年代主动出兵朝鲜半岛，就是涉及到敌对美国在中国边境作出可能改变战略现状的部署。2012年，缺乏外交经验的日本民主党政府将钓鱼岛国有化，抛弃了中日过往在钓鱼岛问题上以“搁置争议”为主的模糊化处理，给中国官方造成极大的危机感。北京判定，日本此举将极大地侵害中国主权这一核心利益，如果不做出回应，将造成既成事实，给中国长远国家安全利益造成极大的损失。

中日关系最为理想的互动状态，是日本勿忘历史，中国宽容大国。两个曾经兵刃相见的国家要化解历史恩怨，绝非易事。面对以上长期的相互认识差距，中日两国首脑都应尝试换位思考，重建信赖关系，慎用军事武力，和平化解当前的领土争端。



美国前情报部门雇员爱德华·斯诺登打开了网络时代的潘多拉魔盒。6月初以来不断发酵，至今仍在发酵的棱镜门事件越来越复杂。

斯诺登其人其事

今年29岁的爱德华·斯诺登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伊丽莎白城长大，后来移居马里兰州安妮·阿德伦德县。斯诺登在高二时退学，一度在马里兰社区学院学习计算机，但最终未修完课程，拿了高中同等学力文凭。后来，斯诺登成了迷恋电子游戏和日本动漫的“电脑极客”。2001年，17岁的斯诺登开始以“呼哈(hooha)”的网名在热门科技博客网站发帖，表露了自己对武术的兴趣和对正规教育的鄙视。2003年斯诺登加入美国陆军预备役特种部队，为的是“通过斗争，帮助伊拉克人民从压迫中拯救出来”，但后来在训练事故中摔断了腿而在四个月后退役。随后，他开始在国家安全局有紧密联系的马里兰大学高级语言研究中心担任保安。2006年5月，斯诺登以电脑高手身份在中情局找到一份工作，并于2007年在“国务院雇员”身份的掩护下被派驻瑞士日内瓦，负责网络安保工作。在此期间他有极高的权限接触到机密文件。此项工作使他发现“即使你没有做任何不对的事，你都会被监视和记录，即使是拨错了电话号码，你过去所有的通话记录都会被调查。”斯诺登在日内瓦期间一度考虑公开那些秘密监视项目，但最后决定放弃，原因是不想致任何人于危险之中，同时抱有奥巴马当选总统后取消一些项目的期望。2008年，奥巴马当选为总统后不但没有约束这些项目，反而对这些项目有所推进和扩大，这使斯诺登大为失望。2009年斯诺登离开中情局，很快，斯诺登加入美国国家安全局，成为常驻日本的一处军事设施的雇员。斯诺登的年薪据悉为20万美元。2010年，斯诺登在论坛发帖称：“社会似乎变得无条件地顺从一些魑魅魍魉的东西。”，他写道：“我们是顺着光滑的斜坡，滑到今天的地步，而其实我们原本可以控制，停止下滑的，还是由于政府无所不在的隐秘行为，在相对较短时间内引发了这种偷偷到来的突变？”2013年5月中旬斯诺登在美国国家安全局位于夏威夷的办公地点拷贝了最后几卷他决心要公之于众的文件，并以养病为由向公司请假。他对自己的女友说他将外出几周。2013年5月20日斯诺登登上了飞往香港的飞机，随后他便一直在香港滞留。在三周多的时间里，斯诺登一直隐藏在一家酒店中。“我能总共只离开过酒店三次。”他表示。2013年6月9日斯诺登经英国《卫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自曝身份，承认他揭露包括“棱镜”项目在内的美国政府多个秘密情报监视项目。



何谓棱镜计划

“棱镜”(PRISM)计划实际上缘起于美国国家安全局代号为“恒星风(Stellar Wind)”的监听计划。2001年9·11事件后不久，由小布什批准实施。奥巴马任内，该项目更名为“拉格泰姆”计划。除“棱镜”外，还包括“主干道”、“码头”和“核子”计划。

根据报道，棱镜计划能够对即时通信和既存资料进行深度的监听。许可的监听对象包括任何在美国以外地区使用参与计划公司服务的客户，或是任何与国外人士通信的美国公民。国家安全局在棱镜计划中可以获得的数据有：电子邮件、视频和语音交

棱镜门中的多棱镜

老木

谈、影片、照片、VoIP交谈内容、档案传输、登入通知，以及社交网络细节。通过棱镜项目，国安局甚至可以实时监控一个人正在进行的网络搜索内容。棱镜项目监视范围很广，包括美国人每天都在使用的网络服务，微软、雅虎、谷歌、Facebook、PalTalk、YouTube、Skype、AOL、苹果都在其中。最终的综合情报文件以“总统每日简报”呈送给美国总统。在2012年内，1477个计划使用了来自棱镜计划的数据。棱镜计划项目年度成本为2000万美元

棱镜门背后的多棱镜

“棱镜门”给美国带来的内外压力巨大，所引发的冲击波短期内难以平息，或迫使美国重新审视其安全策略。

连日来，美国总统奥巴马及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等高官纷纷出面为此事“灭火”。他们提出的三大辩解理由是：第一，“棱镜”项目不针对美国公民；第二，该项目已得到立法、司法、行政三大机构的授权及监督；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棱镜”对反恐有功。反恐是动用一切情报监控手段的“硬道理”？显然不是人人对此认同，一些国会议员直言，尚无证据能证明“棱镜”项目在挫败恐怖图谋上起到作用。9·11事件后美国处处以反恐作为压倒一切的国家使命，甚至不惜动用棱镜计划，在棱镜门事件以前，美国挥舞网络安全的大棒，认为中国等国家对美国网络安全构成了威胁，正在此时，棱镜门爆发，给美国人一个措手不及，美国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被弄了一个哑口无言。一直以来，高调宣称维护个人自由的美国却在私下收集别人的隐私，一方面体现了美国实用主义的双重标准。历史上，美国情报机构对个人的监控早已有之。从1958到1965年，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就曾秘密收集包括总统在内的政界人士的丑闻，归入“零档案”中。胡佛也常常当着被监控者的面把档案放进保险箱，使政界大佬们听命于他。另一方面也是美国不自信的表现。美国爆出情报丑闻往往是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受挫的时刻，如越战时期的“水门事件”，伊拉克战争中的情报门，这些都体现出美国感到逐渐失去世界霸权而产生的焦灼感。

面对棱镜门事件，一系列难题似乎才刚刚开始。

首先，斯诺登是英雄还是叛国者。从目前来看斯诺登就是一个“烫手山芋”。也许美国政府会把斯诺登定位为叛国者，但民众有可能将其定位为英雄。但事情远不止这么简单，将斯诺登定位为叛国者，“采取各种必要手段将这名人泄密者绳之以法”。倘若斯诺登回国受审，这起备受关注的公案难保不将更多机密牵扯出来，到时候，美国政府将会更尴尬。将斯诺登定位为英雄，这样一位学历不高，职位不高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外围人物且掌握了这么多秘密，还有多少个“英雄”掌握着多少秘密，这让美国人民情何以堪？

在国际社会，间谍与反间谍，监听与反监听，棱镜与反棱镜，各国都在做，美国是这样，俄罗斯是这样，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如果把斯诺登定位为英雄，那无异于自己鼓励自己国家的谍报人员自曝家丑，这就是棱镜门事件之后，各国表态非常谨慎的深层次原因，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不难推测，大国当中，为斯诺登提供政治避难的国家少之又少。将斯诺登定位为叛国者，对斯诺登进行

有意思的话

1.“中美经济关系有点像夫妻，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虽然也有吵架，有分歧，但是都必须增进了解，增强互信，培育共同的生活基础。”“我们两家不能走离婚的路，像邓文迪和默克多，代价太大了。”

——7月10日，在华盛顿召开的第五轮中美战

口诛笔伐，甚或将斯诺登引渡回美国接受审判，各国政府想做又不敢做，原因在于政府公权对公民私权的监听、监视早已激起众怒，这样做无异于各国政府既想做婊子，又想立贞节牌坊。所以，老木认为，斯诺登注定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爆出了潜规则内幕，就会被潜规则“内幕”。

第二，棱镜门重创美国情报系统，美国情报体系可能进行内部检讨。9·11事件后，美国在安全领域投入大增，不断招兵买马，但安全漏洞随之增多。作为一个等级并不高的防务承包商雇员，斯诺登为何有权接触到机密，还有机会将其泄露给媒体？据美国媒体报道，斯诺登的泄密行为已在美国情报系统引起震动，按照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的说法，泄密给美国情报搜集能力造成“巨大且严重损失”，可能导致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等情报机构对内部进行全面审查。一名美国情报机构高级官员说，联邦政府正展开的内部调查有别于美国司法部对斯诺登的刑事调查，预计评估棱镜曝光是否危及“线人”或情报获取渠道，可能会调查那些情报目标之间的交谈内容，以查明泄密是否促使他们改变联络方式。这一调查主要在美国情报系统内部进行。美国众议院议长博纳11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称斯诺登为“叛国者”，说泄密“把美国人置于危险境地，向我们的对手展示我们有哪些能力”，系严重违法行为。



第三，奥巴马政府施政步调被打乱。从美税收部门区别对待保守派组织、司法部秘密获取美联社记者电话记录，再到影响更广的“棱镜门”，奥巴马政府接连陷入丑闻，形象受损，也使其在推动移民改革、控枪等重要议题上的步调被打乱。

第四，网络安全，各国需要走更长的谈判合作之路。网络安全问题并不仅仅限于技术、道德、公权和私权，更是一个战略问题。美国已将网络攻击认定为比肩恐怖主义的国家安全主要威胁，把网络视为海、陆、空、天之后的第五大战略空间，正沿袭其上百年来来的战略思维方式，通过网络安全渗透和军备扩张等手段寻求“制网权”，在虚拟世界谋求绝对安全和绝对优势。美国的这一做法必将引发其他国家的仿效、防范，甚至超越。在博弈与反博弈中，各国政府滥用网络公权势属必然，国与国之间相互监听与反监听已成定势，棱镜门事件后，一些国家可以向美国反戈一击，但不排除其他国家出现类似的棱镜门事件后，美国回手反击，这种态势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借助斯诺登事件撬动网络安全问题的契机，各国政府有必要反思自己在网络安全方面对公民权益的侵犯，各国政府更有必要在网络问题上加大对话、谈判、妥协、信任、合作的力度，以期更好地维护网络空间的信息安全、国家利益、战略权益，还有公民的合法正当权益。

(成文于7月11日，一家之言，谢绝转载)

给予他国际人权，保护这年轻人。”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7月5日在委内瑞拉独立日阅兵仪式上宣布了这项决定。斯诺登先前向包括委内瑞拉在内的21个国家寻求政治避难，但多数国家收到申请后即表示拒绝，或是表示有意“考虑”。马杜罗这一决定是否附加条件尚不清楚，但显然为受困机场、逃亡选项越来越少的斯诺登带来了新机会。